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编
重庆市社会科学界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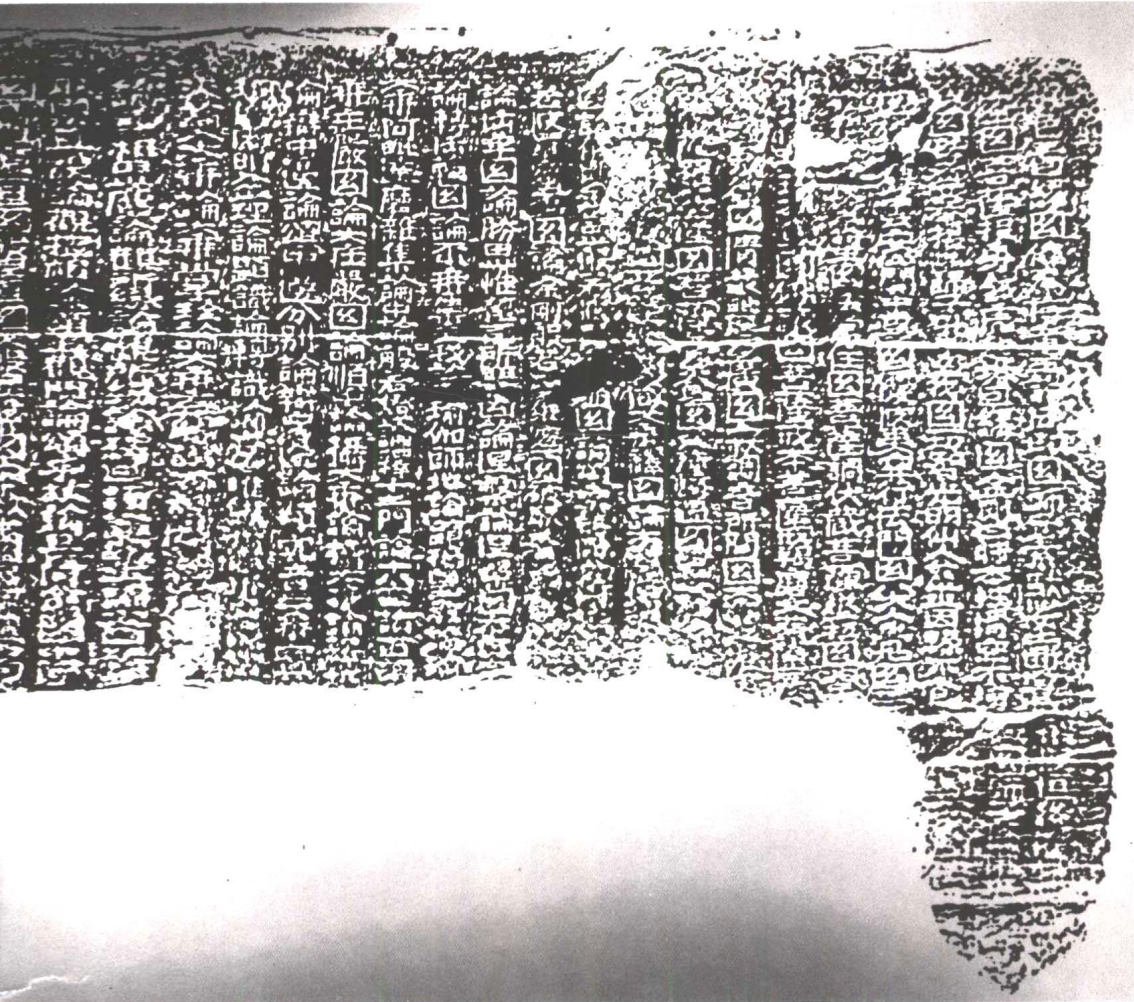
大足石刻铭文录

DAZU SHIKE MINGWENLU

重庆出版社

大足石刻铭文录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重庆市社会科学界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足石刻铭文录/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重庆市社
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编。—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9. 8

ISBN 7-5366-4377-2

I. 大… II. ①重… ②重… III. 石刻文-重庆-大足县
IV. K877.4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8481 号

DAZU SHIKE MINGWENLU

▲ 大足石刻铭文录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编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

责任编辑 廖建明

封面设计 郭 宜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大 1/16 印张 32.5

字数 911 千 插页 6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300

ISBN 7-5366-4377-2/J·640

定价: 61.00 元

序

郭相颖

大足县是重庆市的远郊属县，地处东经 105°28′—06°02′，北纬 29°23′—52′，面积约 1400 平方公里。境内山峦起伏，石岩绵延，沃野平川，鱼米富足，气候温和，四时宜人，取大丰大足之意而名“大足”。其县城，东周时为巴国属地，秦时为巴郡属地，汉时为益州郡垫江县，东晋时为梁州巴郡垫江县，隋时为涪陵郡赤水县和资阳郡隆康县属地，唐初为山南西道合州巴川县与剑南道普州普康县属地。据《元和郡县图志》载：“皇朝乾元元年，左拾遗李鼎祚奏以山川阔远，请割泸、普、渝、合、资、荣六州界置昌州”，“大足县乾元元年(758 年)与州同置”。相沿至今已有 1200 多年的历史。

从州县之兴废和遍布全县的石窟、寺观，特别是现存的众多造像记和伴随造像出现的大量铭文，可以看到 9 世纪末至 13 世纪初的四百余年间，大足是四川东南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重要地区，同时也是宗教和宗教艺术盛行的地区。从唐初至宋末，佛、道、儒三教石刻造像遍布全县，造像余波荡及明清，造像达五万余尊，铭文逾十万之多。宋时昌州享有“东州道院”之盛誉，当今大足享有“石刻之乡”之美名，亦为遐迩闻名的旅游胜地。

大足石刻现存作品最早者，为唐永徽、乾封年间(650—668 年)所造的尖山子摩崖造像，至唐末造像渐兴，南宋达其鼎盛。大足石刻可谓是纵贯千余载，横容儒、释、道的一座艺术宝库。其间的宝顶山摩崖造像，更是于今它处难觅的一个“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古人称其为“几乎将一代大教搜罗毕尽，凡释典所载无不备列”，今之学者公认其为宋时社会思

潮、民俗民风之缩影，造像盈万、图文并茂，系治宋史和中国哲学思想史难得的实物史料。面对如此造像精美、内涵丰富的大足石刻，古人留下的有关文献却了了无几。诸如《輿地纪胜》、《蜀中广记》等虽有提及，但多为一碑一刻，或转记传闻之一时一事，《图书集成》、《四川通志》亦为只言片语，甚至误入邻县条目。时至清嘉庆二十三年的张澍知大足县事，才学过人，慧眼识珍，写有多篇有关石刻诗文，并纳入所撰县志文稿之中。前人之功不可磨，但受时代和条件之限，未能以考古学之科学方法进行全面考察与研究，文体亦多为“游记型”，其文难以反映石刻之全貌，且多有遗误。直至1945年春夏之际，以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先生为首组织的“大足石刻考察团”赴足考察，成就《大足石刻图征初编》作为《民国重修大足县志》之首卷问世。续后本县学者陈习删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成就《大足石刻志略》、《大足石刻概论》等文稿，方为近代学者以学术立场对待大足石刻之始。80年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和大足石刻研究学会诸同志共成《大足石刻研究》、《大足石刻内容总录》诸书，使有关文献得以进一步丰富，但其范围仍为《志略》所及之区，而且偏重造像内容记载，铭文多为少量摘录，仍未能全面记录有关铭文，故令人不无遗憾。

1984年春我就任大足县副县长，分管文化等工作。陈明光同志调县志办公室工作，后任主编。于1984年和1987年，我们根据上级指示和工作需要组织了两次全县性的文物普查工作，新发现石刻数十处，后经各级政府批准公布，全县石窟文物保护单位达75个，做到了地面文物“家底”基本清楚。1990年秋我与明光同回馆工作，分别任馆长、副馆长主持馆务。鉴于石刻风化日甚，铭文迅速消失，深感抢救资料迫在眉睫，加之学术活动展开，著家蜂起，对基础资料需求日胜一日，遂萌编撰全面之铭文书籍，否则我辈将愧对祖先和子孙，然值县级博物馆初建，困于财力与人力，未能遂愿。至1993年，博物馆初具规模，建制趋于完善，更得童登金、黎方银二位副馆长大力支持并参与工作，方决定编撰《大足石刻铭文录》，吾是时提出此次编撰，对现今发现的有关大足石刻的各类铭文，进行抢救性的“扫荡式收集”力求无遗漏，无错误，能圈点、能注释者，则圈点注释，力不能及者不强行为之，留给来者考释，以免误导。众人赞成其指导思想。遂组建了以明光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参加具体工作的有：黎方银、邓之金、胡良学、唐毅烈、张文刚、唐长清诸位同志。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翻山越岭，攀悬崖，登高架，剔苔拂尘，或测量、或录文、或拓片、或

照相，寒暑风餐，行程万里，其艰辛不言而喻。特别是明光、之金二位皆年逾花甲、满头银丝，总是率先垂范，一丝不苟，崇高的文化使命感实在令人敬佩。在完成野外收集工作之后，又开展了紧张的室内编撰工作，为使体例科学，便于查阅，几易其方案，为确保正确无误，常因拓片模糊，一笔一画之识别费尽周折，撰写、打印常通宵达旦。历时三载全仰仗编撰组全体同志的智慧与辛苦方得大功告成，但愿此书能存史之真，收日后研究奠基之效，则为此生之幸！值此付梓之时，吾大有如释重负之愉快，特为斯文，一者，对为弘扬民族文化不辞劳苦，勇于奉献的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二者，由于我们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尽管力求无遗憾，但遗憾在所难免，敬请各位方家、读者不吝赐教，斧正其谬。

1997年6月22日初稿，1998年12月定稿于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凡例

一、大足石刻铭文录(简称:铭文录),是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采取文物考古之科学方法(拓片、照相、测量、现场考订文字),搜集整理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古塔中的铭文集成。旨在抢救保存石窟、古塔中湮蚀日甚而又不可再得的铭文文物资料,以为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保护、研究、宣传大足石刻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铭文录收集范围、时限:凡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古塔(均含其保护范围内的古建筑)范围内的刻、写、铸在不同质地上的各类、各种铭文,上自初唐永徽、下迄民国末年(650—1949年9月30日)时限内的,均在收录之列,并力求不遗漏。今已湮灭、著载历史文献的重要铭文,亦可据文献收录。

三、铭文录体例:采取以一个或多个石窟、古塔设编目,编下以事分类,横排纵写。编目前列序、凡例、概述,附录、编后记殿后。

四、铭文编写:一律以一事一件为一目(龛窟造像题刻不受此限),设置“名称、形制、铭文、附注”四个栏目,以事类、按时序、分地区、统一序号,一件一目编写。部分碑铭增设置拓本照片,以益读者。

五、铭文编录:(一)除个别件铭文横排不能表达文理外一律横写,断行不断句连行实录,行与行之间加注“|”间隔符号,末行后书上句号,以示录文完。(二)按碑刻行文格式分行录写的碑铭,行末仍书“|”间隔符号,末行字录完书上句号。(三)铭文中的繁体字,除个别字可能引起歧义照录外,一律按照国家规范的简化字录写;铭文中的“异体字”(含

字书中不常见的字、历史文献上的别字及石刻作者的“自造字”），能辨识者书写为《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字，并列对照辨识表附载于全书之后，以资读者查阅、考订。不能辨识者，照原文字实录。

六、铭文编录中技术性处理：（一）凡碑铭行文行中的空字位，一个字位书写一个三角形符号“△”。（二）凡碑铭中的湮灭字，一个字书写一个方框符号“□”，不明字数的在字里行间夹注“（湮）”字表示。统计字数，以现存字位为限。（三）据文献校补的碑铭中已湮灭的字，夹注在黑体方括号“【 】”内，并在“附注”栏内注明其出处。（四）录碑铭中依稀可辨的字，夹注在一般方括号“〔 〕”内，以利读者辨识订正。

七、本铭文录编纂，除“铭文”栏中碑铭照录外，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简化字、标点符号遵照国家统一的规定。民国之前的纪年，按历史习惯记述，夹注公元纪年。公历世纪、年、月、日及民国纪年，一律书写阿拉伯字。地名，按记述时限书写其名，可夹注今名。人名，一律直书其姓名，不冠尊称。

八、本铭文录计量，一律用全国通行的公制为单位。长度，以厘米为单位，行文中略去“厘米”2字。面积以平方米为单位。碑铭尺量，以高、宽、厚顺序书写。龛窟大小，以高、宽、深顺序书写。龛窟方位，以其本身背向、左右定位。字径，未注明者均为横径。字体，未注明者均为楷书。

概述

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

《大足石刻铭文录》即是全面搜集大足石刻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刻、写在不同质地上的各类、各种铭文整理、编纂集成。

大足石刻造像据纪年镌记问世于初唐永徽(650—655年)，大兴于晚唐景福元年(892年)刺史韦君靖开凿北山石窟之后，历经前蜀、后蜀(五代)，至南宋达到鼎盛。宋末造像中断，元代未发现一碑一刻，明初造像复苏，余绪至晚清。

大足石刻名下，今公布为全国及四川省、重庆市、大足县文物保护单位的唐、宋、明、清各代石窟75处，造像5万余尊。造像内容儒、释、道“三教”并臻，但仍以佛教为最。佛教造像中又以密教为特色，如晚唐开凿的北山佛湾石窟造像290龕窟，其中密教题材就占三分之二左右。摩崖造像近万的宝顶山石窟，又是号称“六代祖师传密印”的大足僧人赵智凤，承持晚唐四川柳本尊创立的瑜伽密教，于南宋淳熙至淳佑(1174—1252年)的七十年间，营造的一座被称为是完备而别具特色的密教道场。

中国石窟建设兴起于南北朝，盛行于丝绸之路和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历经隋唐辉煌，至唐之中叶走向衰落。大足石刻造像于晚唐至两宋崛起，其历史价值正如民国“大足石刻考察团”团长杨家骆论道：“正当中国石刻史存亡续绝之交，其时代虽然晚于云冈、龙门，然在艺术之演进与历史之延续上观之，其价值堪称无匹。”^①宋末之后，中国石窟建设一蹶不振，大足石刻也就是石窟史上的最后一座丰碑了。然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史失其载，直到20世纪40年代杨家骆发觉并组团考察后，方渐为国人

注目，被誉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大足石刻领导前期石窟的显著特色之一是变相与变文并重，造像龕刻经文、经目、偈颂等文字数以万计，多是未为历代藏经所收入的藏外佛教文献。石窟中至今未泯的造像记和培修、装绚记及碑碣、题刻等文字多达十万，这不仅是大足石刻研究的学术资料，还是可证史之误、补史之缺的珍贵史料。然而这些石刻铭文，历经千百年不少已湮蚀殆尽，且又无一文献全录保存。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为抢救保存这份不可再得的文化遗产，1993年即组织人员进行搜集，以期编纂辑成这部《大足石刻铭文录》，旨在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保护、研究、宣传大足石刻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大足石刻分布于大足县属32个镇、乡的28个镇、乡境内。

大足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重庆市西部，总面积约1400平方公里。东邻铜梁，西连安岳，北接潼南，南界永川、荣昌。成渝公路、铁路穿过县南境。由高速公路西上成都250公里，东去重庆83公里。

大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析合州巴川县绥仁乡地与昌州同置，以横贯县境东西的“大足川”(濑溪河)为县名，隶昌州。昌州与州同置的昌元(今荣昌)、静南(析普州普康县地置，以治地“静南坝”为县名，宋初省入大足。其境为今大足西南半县，高升镇太和村张家坝是其县城遗址)^②、大足三县，州治昌元。唐代宗大历六年(771年)，张潮、杨琳起事焚蕩州治，于是州、县俱废，地各还其属。大历十一年(776年)，复置昌州，迁州治静南。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年，一说景福元年，892年)，刺史韦君靖徙州治大足，直到宋末历时近400年未再迁徙。若包括州治静南在内，则为500余年。大足石刻中最早的初中唐石窟——尖山子、圣水寺摩崖造像，即在静南县治所在地。

晚唐乾符之际(874—879年)，黄巢义军席卷中原，蜀中“三川鼎沸”。时守昌元令的韦君靖“睹兹遐僻”，利用偏处川中的地利条件，“合置义兵，招安户口，务织劝农，足兵足食，以煞去煞”，组建一支强大的地方武装，据守昌州，从而也促使大足地区的人口、经济获得大的发展。中和年间(881—884年)，蜀中相继发生涪州韩秀升起义，东、西川藩镇征战，王建征讨陈敬瑄等著名的“三川”之战，韦君靖几乎无一役不

从，由是步步荣升，至大顺元年(890年)，获授使持节都督昌州诸军事、守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静南军使，于是大足又成为静南军节度使治州的军事重镇。景福元年，韦君靖睹“江涛未息，云阵犹横”，为保境安民，又“维龙岗山(北山)建永昌寨”，“什伍其民”，“粮贮十年，兵屯数万”，立壁自守，静观待变。然至乾宁二年之后韦君靖不知所踪，但静南军直到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年)，王建置遂州武信军领遂合昌渝泸五州方罢。韦君靖于建寨的同时又于北山佛湾凿崖造像^③，为这座造像盈万的大型石窟的建成奠定了基础。

宋初，昌州升为上州，大足升为上县。足见前后蜀年间，大足政治上安定，经济上发展。时至南宋，随着宋高宗迁都临安(杭州)，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四川成为南宋王朝的大后方，昌州一度成为朝廷进行“类省试”的“置司”之州，亦即潼川府路治所在之州。淳熙十三年(1186年)四月，来自资中、广安、眉山等地的应试举子刘子发等拉游北山佛湾题刻：“较试南昌毕事之三日……拉游北山(佛湾)，徜徉竟日”^④，至今墨迹尤新。于是可见，南宋昌州治大足，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和影响，大大扩展，成为潼川府路的活动重心。

大足自晚唐为昌州治，历两蜀、两宋长达400年，至蒙古大军由川北南下进犯昌州之前，大足境内没发生过的兵事，即使蜀中发生大的战事，其烽烟也很少辐射昌州。大足400年州治，300多年安堵，人丁兴旺，生产发展，手工业发达，场镇经济兴盛。北宋元丰时，昌州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24人，超过合州(约21人)、渝州(今重庆，约6人)。《元丰九域志》载：巴蜀诸路177县，14镇以上者仅七个县，大足居其一为五乡十四镇。《图书集成·食货典》载：熙宁十年(1077年)前诸州的商税额，昌州达五万贯以上，超过了渝州五万贯以下。宋时大足不仅场镇经济处于四川领先地位，且富贾云集，庄园林立^⑤。时至南宋“人文之盛，荣与渝敌”^⑥。

《舆地纪胜·昌州》载：“静南山水奇秀，士大夫避地者多居焉”。北宋太庙斋郎解瑜“家资亿万，豪冠两蜀”，其先祖解达则是随唐僖宗入蜀，而后定居大足的^⑦。拥有石篆山等处庄园的大庄园主严逊，亦是在北宋天圣中随父由遂州避居昌州的^⑧。大足政治上安定，士大夫、富商、庄园主聚居，加快了大足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为大足石刻崛起准备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大足地扼巴蜀文化交汇处“川东道”。毗邻潼南、安岳、合川等地，早

在北周至隋唐，或佛、或道石刻造像就相当活跃，对大足石刻造像的兴起不无影响。大足石刻中的初、中唐造像，即是普州(治安岳)普康县境内的产物。但具规模的石窟造像，又无不是在晚唐之后，四百年州治、三百年安堵时期的作品。如北山石窟，即是在徙州治大足的第七年韦君靖开凿，至南宋绍兴历 250 多年建成。北宋初期寺院内造像供奉兴起，今有文可征、或有遗迹可寻者，有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石壁寺，咸平至皇佑、嘉佑年间的大钟寺，以及县城北的延恩寺等处^⑨。但至北宋元丰之后到南宋蒙军侵及昌州之前，摩崖造像又此起彼伏不已，全县凿造释、道及“三教”造像石窟 30 多处。大足石刻中的大、中型石窟多于此间建成。宝顶山造像中未全功之作，恐即因蒙军进犯而中断留下的半成品佳作^⑩。

宋末元季兵燹一劫，大足至元初废州县人合州。至元末，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夏政权时方复置大足，隶合州，明初改隶重庆府。从此，大足失去了宋时州治重心地位，故历元明清三朝 600 多年间，虽然明永乐复有石刻造像，但远非昔日的壮丽辉煌。

二

大足素称“石刻之乡”，唐宋以来的摩崖造像遍布县境的青山翠岭、河畔崖壁。恐因它大兴于晚唐藩镇割据之际，崛起于蒙军大举进攻四川之时，由于时代的变迁，致使史失其载，历元明清三朝不为国人注目。文献有者，仅如《輿地纪胜》、《蜀中广记》，所言仅一碑一刻、一时一事，不能窥其全貌。明末清初兵燹，又使大足在康熙至雍正年间由荣昌知县兼摄大足县事，以至《图书集成》、《四川通志》于大足石刻无只言片语，还将北山“韦君靖碑”、《古文孝经碑》等载入荣昌。至嘉庆二十三年，知县张澍方首注目大足石刻，但他由于时不过半年去任他所，力亦未能使大足石刻名世。直到民国抗战胜利前夕，在渝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从《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山脉》中发现，载有“中外人士之言者未及之”的北山、宝顶山等处石刻^⑪，继于 1945 年春夏之际，同史家马衡、顾颉刚、傅振伦等组“大足石刻考察团”赴县考察旬日，方首以可与云冈、龙门石窟“鼎足而三”正告国人。考察团还以为，此次考察团之成就“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⑫。然而，是时考察团主对北山、宝顶山、南山等处进行了查看，还未得识今之大足石刻全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珍视这处国之瑰宝，50 年代、

80年代，先后进行了三次文物普查，方获得大足石刻的总体规模和现存内容。

建国之初，1951年西南文教部即派专家张圣奘赴县视察，此后国家拨款培修不断。1952年，大足县人民政府即成立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加意保护。1953年“土改”中，县政府明文公布保护已知的13处石刻造像和古塔：北山、南山、宝顶山、舒成岩、石篆山(含千佛岩)、石门山(含陈家岩)、佛安桥、玉滩、七拱桥、妙高山石窟和多宝塔。

1954年6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员赴县调查文物，对公布保护的13处造像进行检查、编号、登记。其编号沿用至今。7至12月，县文管所遵照县政府第103号文件通知，首次对全县文物古迹进行调查，其中查得石刻造像50余处，古塔4座，寺观115座。

1956年，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窟和多宝塔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国务院又将其中的宝顶山、北山石窟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县政府组织以副县长蒋明哲为组长的工作组，赴各文物保护单位划定文物保护范围，并由文管所竖立文物保护标志、安置石碑界石。

“文革”刚结束，1976年12月，中共大足县委即恢复县文管所建制，并首次调配陈明光任所长。1980年，省政府重新核定公布全省文保单位名单，又将石门山石窟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县政府贯彻国务院文件，组织以分管文物的副县长为组长，以计建委副主任为副组长，有规划、环保、外事、文物等部门参加的工作组，对省以上的文保单位的保护范围进行复查，再次划定界桩。

1984年10月，县文管所遵照省、市文物管理部门布置，进行全县范围的文物普查，至1985年10月结束，选报县政府核定、于1986年1月公布为大足县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25处。1987年5月，县政府遵照省、市布置，成立县文物普查办公室，再次抽调组织专人进行文物普查，历时6个月结束，报送县政府核定、于1988年9月公布为县文保单位的石窟36处。至此，大足石刻名下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多达73处。1996年1月，县政府又公布佛尔岩、杨施庙2处，于今共有石窟75处。

此外，在文物普查过程中还发现了两处北宋寺院遗址出土的圆雕纪年造像。一是万古镇长生村(时属新石乡)大钟寺遗址，出土咸平、皇佑、嘉佑年间圆雕石刻百余件；二是金山镇六合村大坝双河口边寺院遗址，出土露头的圆雕菩萨像数件，镌记(湔灭)与大钟寺石刻同位于像座正面，风格亦

大类。在普查前后还发现有佛耳岩宋延恩寺遗址，和石壁寺北宋大中祥符圆雕纪年造像。仅此可窥视，北宋年间寺院造像供奉兴盛。大足石刻造像，由于自身固有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90年代以来又有多处石窟升为全国和省、市的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尖山子、妙高山、舒成岩、千佛岩石窟被公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妙高山、舒成岩石窟又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国务院公布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又将石门山和南山、石篆山石窟及多宝塔，分别归入到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宝顶山和北山摩崖造像范围内。至此，大足石刻名下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含多宝塔)，省、市文保单位4处，县文保单位65处。

对这75处石窟从时代分：唐代3处；宋代33处；明代27处(寺院圆雕像3处)；清代12处(圆雕1处)。

从造像题材、内容上分：唐宋石窟36处，其中佛教造像20处(唐代3处、宋代13处，包括北山、宝顶山两座大型石窟在内)，道教造像4处，“三教”造像5处，佛、道造像7处；明清造像39处(明代27处、清代12处)，除明永乐开凿的千佛岩、七佛岩、大石佛寺3处为规模较大的佛教造像外，其余多为3、5龕、至多不过10龕的小型石窟，造像题材、内容雷同而庞杂。今从石窟中的主像分：佛教造像24处(明16处、清8处)；佛、道造像8处(明6处、清2处)；道教、“三教”造像各1处(明代)；其他5处(明3处、清2处)。从75处石窟的建造年代、造像题材与造像数量结合看：初中唐佛教造像2处，但像不过300尊；晚唐至南宋石窟数量虽然只有34处，但几乎包括所有的大、中型石窟，造像数量占大足石刻造像总数的约80%左右，道教、“三教”造像窟都建成于其间。于是不难看出，晚唐以后至南宋时期是大足石刻造像的黄金时代。

三

大足石刻铭文，包含石窟、古塔文保单位范围内，刻写在不同质地上的各类、各种内容的文字，概略有四大类：造像龕刻经文、经目、偈语、颂词等；乞佛人造像镌记、题刻和石刻匠师题名等；石刻培修、装绚碑刻、题记等；历代碑碣、题刻、诗词、游记等。

1993年，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即组织人员采取文物考古之方法，首先搭架(至高处12米)搜集宝顶山石刻铭文。1994年，相继陆续搜集北山

石刻、多宝塔及全县 70 多处石刻铭文。至 1996 年完成，计拓碑刻 1167 方，拓片 2033 张(至大张 9.8 平方米)，现场照相 2500 多张，就地测量、考订、记录资料约 35 万字。

历时三年多的铭文搜集工作，对 75 处石窟、两座古塔和寺院遗址出土石刻逐一进行了搜寻，结果有 18 处小型石窟(宋 5 处、明清 13 处)未获一件铭文。本次铭文搜集工作，不仅做到对原掌握的无一件遗漏，且对造像内容、纪年造像镌记和碑刻等均有所新发现。

1994 年，在搜集宝顶山铭文实践的基础上，即着手制订了编纂《大足石刻铭文录》的《凡例》和《纲目》(初稿)，以指导进行铭文的搜集、整理、考订、撰稿工作。1996 年 5 月，在铭文搜集大成的情况下，视石窟规模、开凿年代、造像内容、铭文数量及其特色，修订了《凡例》和《纲目》。据此，把已收得的 57 处石窟和古塔的铭文，分五编总纂辑成《大足石刻铭文录》。

第一编：集初中晚唐开凿的 3 处石窟(尖山子、圣水寺、北山)为一编，以体现大足石刻中的唐代系列造像。

第二编：南宋宝顶山石窟单为一编，以突出龕刻经、偈、颂文多及其完备而别具特色的密教石窟道场的造像内容。

第三编：集两宋 27 处石窟为一编。两宋造像共 33 处，除宝顶山单列和未搜得铭文的 5 处外，本编 27 处石窟分成四个部分编撰，以体现宋代造像“三教”并臻的特色。第三编之一是 4 处道教造像窟，南山、舒成岩、玉皇庙、佛儿岩；之二是 5 处“三教”造像窟，石篆山、妙高山、佛安桥、佛尔岩、石壁寺；之三是 6 处佛、道造像窟，石门山、峰山寺、老君庙、石佛寺、半边寺、三存岩；之四是 12 处佛教造像窟，玉滩、三教寺、张家庙、兴隆庵、灵岩寺、普圣庙、七拱桥、青山院、普和寺、佛耳岩、潮水寺、菩萨岩(高升镇)石窟。

失去铭文的 5 处石窟是：陈家岩、保家村、板昌沟、桂花庙、福兴寺。

第四编：合明代、清代 26 处石窟(明 18 处、清 8 处)为一编。明清造像共 39 处，除未搜得铭文的 13 处(明 9 处、清 4 处)外，本编 26 处分成明清两部分编撰。第四编之一是 18 处明代造像窟，千佛岩、大石佛寺、七佛岩、九蹬桥等；之二是 8 处清代造像窟，双山寺、全佛岩、柿花村等。

第五编：南宋多宝塔、晚清文峰塔合成一编。

附录：宋代大钟寺遗址出土石刻镌记和 4 件墓志铭碑。

上列五编及附录共收载铭文 1009 件，计 106410 字。从铭文类别及时代析：

1. 宝顶山石刻经偈颂 368 件，计 20480 字；
2. 乞佛人造像镌记、石刻匠师题名 286 件，计 14815 字。其中，唐代 17 件，前后蜀 22 件，宋代 175 件，明代 41 件，清代 26 件；
3. 石刻培修、装绚记 155 件，计 20314 字。其中，宋代 10 件，明代 26 件，清代 11 件；
4. 碑刻、诗词、游记 180 件，计 45757 字。其中唐代 2 件，宋代 44 件，明代 24 件，清代 92 件，民国 18 件。

附录 20 件，计 3044 字。其中，北宋大钟寺遗址出土石刻造像镌记 16 件，宋墓志铭碑 4 件。

《大足石刻铭文录》编纂告成，是大足石刻研究史上空前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亦是一项可填补中国石窟研究晚唐至宋末时期学术史料空白的科研成果。

四

《大足石刻铭文录》的纂就、出版，为大足石刻研究，以至为中国石窟史、艺术史、宗教史及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份科学的、舍此不可他求的石刻文献。

其一，宝顶山石窟龕刻经偈颂文 368 件，它不仅是历代藏经未收入的藏外佛教文献，而且还可为藏经增添新页。如地狱变刻《大藏佛说护口经》，历代藏经中就无此目；牧牛图刻“杨次公证道牧牛颂”，就可补释史之缺页。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柳本尊行化图刻柳氏苦行“十炼”题记，和南宋祖觉禅师撰《唐柳本尊传》碑。碑记柳氏于唐末、五代年间，自创教派，苦行教化，“十炼”成佛。石窟中图文并举表明，在开元三大士传承的密教，至唐之中叶走向衰落之后，四川柳本尊教异军突起，弘化于两川。到南宋，大足僧人赵智凤又承持其教，并将其发扬光大，且创建了一座被称为是完备而别具特色的密教大型石窟道场。石窟造像柳、赵二本尊多居主尊位，并作大日如来装束。中国人成佛，这在佛教史上是个重大突破。柳本尊“十炼”题记和《传》碑及柳、赵二本尊成佛像，不仅为密教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亦为佛教考古学提出了新课题。

其二，乞佛人造像镌记、题刻 302 件，其反映的内容之丰富，既可窥视大足石刻的兴衰，又可探索石刻造像崛起的成因，亦可得见唐宋以来世俗信仰的变化发展。如仅视各个时期造像镌记的数量及其分布情况，即可

窥得大足石刻兴衰的梗概：初中唐 200 多年间 1 件，镌存初唐尖山子石窟中；晚唐乾宁至后蜀广政 60 多年间 36 件，全刻存在北山石窟；北宋元丰之前百余年间 18 件，其中除北山石窟 1 件外，16 件是大钟寺出土石刻纪年造像镌记、1 件是石壁寺圆雕像纪年镌记；元丰至南宋绍兴、乾道百余年间 171 件，其中北山石窟 31 件、多宝塔 54 件、第三编 26 处石窟 86 件；南宋淳熙至淳佑近百年间，除宝顶山石窟外，仅在灵岩寺搜得 2 件；明清至民国 500 多年间 72 件，其中镌刻在明清开凿的石窟中只有 57 件（明 38 件、清 15 件、民国 4 件）。仅此即不难看出，晚唐至南宋是大足石刻造像的黄金时代。如果把造像镌记与石窟造像数量等结合起来，更可进一步看出：初中唐造像是大足石刻的序品；晚唐至前后蜀年间掀起第一个高潮，但限在北山石窟范围；北宋初期百余年间，摩崖造像停滞，寺院内造像供奉兴起；北宋元丰至南宋绍兴、乾道年间，摩崖造像大兴，至赵智凤营造宝顶山石窟达到鼎盛。宋末造像中断，在历经元代百余年后，至明永乐虽然复苏，但不足为道。于是，一部大足石刻造像兴衰史跃然呈现。

再如从晚唐至南宋 200 多件造像记残存内容探索，至少可征得大足石刻造像是在是时崛起，其明显的直接成因有三：

一可窥见，凡大中石窟多为地方官员、士绅倡首乞佛而兴。如：晚唐开凿的北山石窟，就是昌州刺史韦君靖开凿，继有刺史王宗靖，节度左押衙赵师恪等；前后蜀年间有第三军副将种审能，右厢都押衙知衙务刘恭，通引官行道王承秀；两宋年间知昌州军州事张莘民、任宗易，昌州助教刘揆、录事参军赵彭年、充宁十将文志等。多宝塔有泸南沿边安抚史冯大学施银六百贯文足造塔第六级。南山石窟乃乡贡进士何浩之父何正言舍地开山凿造。石篆山石窟又是大庄园主严逊置地经营建成。佛安桥石窟即当地“庄主”古及之等兴造。宝顶山更是在朝廷大员魏了翁、杜孝严和府、州官员支持下建成的一座大型石窟。即使明初石刻造像复苏，亦与蜀献王朱椿“驾临宝顶”相关。

二可发现有一批识高志坚的僧、道主持凿岩造像，他们为大足石刻的崛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北山石窟，晚唐一开始就有“都典座”僧明悟，前蜀间有“大足县僧会□亮”，宋代有掌岩道士僧志诚。其他处，如北宋大钟寺有僧令儒、僧淳朴；石篆山有蜀中名僧希昼；多宝塔有化首任亮、砌塔道人邢信道；南山有开山化首张全一；舒成岩有掌岩道士王用之；石门山有“施主”僧法顺、住持文盛道；佛安桥有化主僧思旦，玉滩有住岩僧法隆等。他们在教理和艺术上都应是有相当素养的僧侣，不仅仅